

王文剑 著

弓与犁

草原与中原的和与战



山东画报出版社

弓与犁

草原与中原的和与战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弓与犁：草原与中原的和与战 / 王文剑著.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8.1

ISBN 978-7-5474-2453-7

I. ①弓…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研究
IV. ①K2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24410号

图书策划	韩 猛
责任编辑	王一诺
装帧设计	王 钧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舜耕路42-1号 邮编 250014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48毫米×210毫米 6.5印张 150千字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定 价	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

在中国历史中，中原和草原的关系充满各种戏剧性的故事，在故事中，所有能够想到的和想不到的人，成为主角，撕开历史的帷幕，或成为配角，增添历史的精彩。胡服骑射，孟姜女哭长城，白登山之围，昭君出塞，李陵反叛，苏武牧羊，文姬归汉，鲜卑汉化，木兰从军，忠烈杨家将，岳飞北伐，戚继光守边……这些故事以各种形式和载体，将草原和中原的文化带入中国史之中。那些跌宕起伏的情节和桥段，让中国史更加精彩且耐人寻味。复杂多变的对抗和融合，成为历史车轮滚动的重要动力。中原王朝的变革与发展、兴替和延续，与草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而草原上的分与合、兴与衰，与中原政权的更迭存在内在呼应。因此，失去草原的中国史既不完整，也使中国史的内在构成与走向缺少合理解释。缺乏解释的历史书写，还能成为历史么？走出童话和神话的世界，应该是一个族群心智成长、成熟的重要标志。

只是在儒生们撰写的传统史籍中，对草原民族的勾勒与描述始终存在一种明显的偏见。这种偏见源于文化的隔膜以及文化层面上

的差异。华夷之分，存在于一代又一代的中原人的观念中，作为一种基因传承下来，在民间话语中更加强化了这种观念。后人沿着这单一的视线将眼光投向草原，无论在庙堂还是民间，草原的形象日趋脸谱化、表面化。最终在民间认识中，那些生活在长城以北的游牧者，几近于饕餮或者其他什么面目狰狞的怪物。显然，真实的历史不是这样的。

草原民族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喜怒哀乐、诉求和立场，在传统史书的正面和反面虽有所呈现，但清晰度是不高的。坚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主张，不修正“华夷之辨”的观念，如何能让我们看清楚真实的草原？一个面目模糊的草原是令人困惑的。巴菲尔德在《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一书中指出，游牧民族与汉人在世界观上的不同，使双方经常处于彼此“误读”的状态。因此，把中原作为文明的恶人或善人，或者将草原作为野蛮的罪人或者弱者，都是一种幼稚的视角。只有站在第三方看待两者的行为、动机和立场，才有可能真正发现草原和中原关系史中的真相，也有可能把其中的吊诡之处解开，清理出其中简单明了的历史逻辑。

《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是一个痛恨“人类中心主义”的学者，他站的位置不是“此处”，也不是“彼处”，而是“此处”和“彼处”的上方。正因为有这样的立场和视角，他看见了“此处”（智人）的荒诞性和那些强词夺理的“正义”，看懂了“彼处”（被智人征服和使用的物种）的悲哀和反抗中的壮烈。因此，他否定了对强者有利的各种“主义”和“权利”，甚至“科学”在他眼里也是智人否定和剥夺其他物种而获得自身快感的工具。站在这样的视

角看，科学也充满罪孽，或者说，是智人犯罪的工具。中原和草原之间的纠葛、恩怨和交融，也应该抛开“非此即彼”的视角，否则，我们只能像老鼠追咬自己的尾巴一样，虽然在奔跑，但实际上是在原地打转。

自从著名学者拉铁摩尔重新发现草原和中原的关系之后，这个话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气象学家等诸多学科的研究者。从目前已经达成的共识看，大家比较认可由于地理位置上的差异，导致草原和中原在气候上的差异难以调和，气候上的差异又使草原和中原在食物品类以及获取食物的方式上完全不同。沿着这条逻辑线往下走，大致以长城为草原和中原的分界线，长城南北在生产方式、生活形态、文化表象和内涵以及思维方式方面，则很难交融在一起——即使几千年的频繁交往，也很难做到。这种局面当然与草原民族和中原人的主观努力无关，只能解释为环境及文化制度使然。当然，最终草原和中原融为了一体，在文化和感情上彼此尊重、彼此扶持。两千多年的岁月，让我们深深地认识到人与人、人群与人群之间无论肤色、层级、地域，最宝贵的不是交换，不是舍取，而是信任。

本书基本遵循了上述的理念，但在具体的叙述中，则更多地运用了经济学的思维方式阐述这些理念和观点。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我多年来研究经济学理论，在思想深处种下了“一颗经济学的种子”。因此，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用经济学方法、思维和视角研究历史的经济学著作。

本书在成书之前，其中大部分章节已经在《信息时报》以专

栏的形式发表过。之后，又经过了两年多的不断增删，在2015年，被静雅思听网站收录，做成有声读物。在以书的面目呈现给大家之前，这本书的内容已经有两个“身份”。但本书又有着很多不同之处。在书中，我选择了几个重要的话题和事件展开叙述，比如如何看待长城的作用、“澶渊之盟”背后蕴含着怎样的历史隐秘、成吉思汗交给丘处机的“止杀令”是否发挥作用等等。希望这些章节都能够启发读者重新打量草原和中原二千多年的战争与和平交织的历史，从而让我们以更加理性的视角看待我们的历史，还有那个曾经让我们迷惑而充满神秘感的草原。

最后，在我对这本书的修改过程中，我的母亲、爱人和女儿给予了我无私的支持，这是我完成此书的最大动力和力量源泉。更重要的是，我感谢我已故的父亲，是他的谆谆教诲以及最直接而有力的鼓励，才使我最终完成这本书的写作，这本书也是我对他深切怀念的寄托。

而对我而言，中原和草原关系这个话题的探索也才刚刚开始。此时，我发现自己深深地爱上了那片曾经陌生的草原和那个存在于想象中的北部边疆，那里是如此充满魅力，让我心仪，不能释怀。

目 录

长城的问题	/ 1
都是水惹的祸	/ 24
脆弱的草原	/ 43
马上的骄傲	/ 60
长城边上的第三种人	/ 79
耶律德光的难题	/ 94
“天可汗”的神话	/ 111
澶渊之盟的隐秘	/ 125
止杀令	/ 142
明朝的边疆危机	/ 160
紧张的明朝都城	/ 176
参考书目	/ 191



扫一扫收听本节音频

长城的问题

秦朝以后，汉朝、明朝等中原王朝为保卫自己的家园，在北部边疆修筑长城抵御草原民族的侵袭。但从实际效果看，我们却很难评价。

表面上看，长城对处于防守一方的中原王朝非常有利。大家可以想象，中原王朝派出数量不多的兵将，站到城墙上张弓拉箭，以逸待劳，在冷兵器时代或半冷兵器时代，这种打法确实省力，防守效率奇高。守卫长城的部队万一被草原军团搞了偷袭，也没什么可怕的，可以依靠长城上的烽火台传送消息，召集各地人马，齐聚一起，打好了，来个反偷袭，全歼敌人，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可是，大家知道，抵御敌人进攻，最好的部署是在同一个方向上建立多道防线，形成防守的纵深。如果只靠一道防线抵御敌人，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原因很简单，这条防线一旦在一点上被敌人突破了，远处的援军没来得及跑过来对敌人围追堵截，那么，整个防

线在瞬间就可能被攻破。

从这个意义上看，长城即使修得再牢固、再漫长，其实际用处也是极为有限的。从历史记载看，长城也确实从未真正把驰马呼啸、弯弓射雕的草原军团挡在墙外。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并不是大家普遍理解得那样强。

黄河、长江的军事防御功能与长城极为类似。黄河、长江这类号称“天堑”的防御屏障，肯定有利于防守，但仅指望这两条河流就把敌人挡住，则显得过于一厢情愿了。懂点军事的人都知道，要想守住长江，必须守住淮河以及淮河到长江之间的平原。一旦敌人突破淮河，而且还攻占江淮平原，这时候长江也就成了“摆设”。那些守长江的江南政权，比如东晋、南宋，在江淮地区投入的军力往往都要远高于沿江地区。而争夺江南政权的决定性之战，也很少发生在长江沿岸，大概只有赤壁之战和忽必烈攻打鄂州的战斗等为数不多的战例，长江才发挥了很重要的防御功能。

既然实际军事功效被打了折扣，那么，修长城还是不修长城就成为一个始终困扰中原王朝的问题了。从秦以后，真正大规模修筑长城的中原王朝其实并不多。汉朝在其建国初期算是勉强地使用过长城，也曾对秦朝留下的长城打了很多“补丁”。然而，汉朝后来真正能抵御住草原民族的侵扰，其实与长城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匈奴南侵的问题，主要还是因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大力发展骑兵部队，采取主动出击的作战方式，举倾国之力最终打败匈奴，逼得这个草原民族一部分北迁，一部分西逃。后来，到东汉时期残留在草原上的匈奴则不得不南附，也就是投降汉朝，

成了汉家臣民了。

虽然汉武帝终其一生也没有彻底解决匈奴南侵的问题。但他死之后，匈奴那种不把汉朝当回事儿的嚣张气焰确实被打压了下去。在他之后的岁月里，汉朝打出“战争”“和亲”和“贸易”等一系列组合拳，因匈奴的侵扰而带来的损失则被大大降低。

和草原帝国对抗，无论从财政能力，还是从军事实力，晋朝都不算是一个太有成就的中原王朝。虽然晋朝也对长城做了很多次修补，但规模和秦汉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也就是在晋武帝时，监幽州诸军事的护乌桓校尉唐彬重修了 3000 多里秦代长城和城塞，但实际效果却不好说。毕竟，国内一团乱麻，“八王之乱”已经把晋朝搞得不堪一击，即使草原民族不来打它，晋朝其实也很难支撑下去，长城的作用在晋朝很难被评估。

到了南北朝时期，虽然长城南北都算是鲜卑民族的势力范围，但长城却被大规模修葺了三次。北魏虽然也来自草原，但自从孝文帝力排众议带着大家伙儿把家搬到中原后，鲜卑人的势力也逐渐南移，原来被他们看不起的柔然民族抓住机会，鸠占鹊巢，在草原地区崛起。从此，北魏帝国不断被柔然骚扰、偷袭，深受折磨。这个在草原上起家、靠弓马闯天下的帝国也不得不打起长城的主意。不过，因为北魏把长城防线修成一条单一的防线，缺乏弹性防御设施，长城在北魏的手上也没发挥出太大的防御效果，其军事价值非常有限。

唐朝建国之时，唐太宗李世民就以皇帝兼“天可汗”的双重身份，成为中原王朝和草原民族共同尊奉的“一把手”。终唐一世，基本没听说过有哪个皇帝动过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念头。在安禄山造

反之前，在河北、山西等传统的汉族聚居区，实际上早已呈现出“胡汉混居、不分彼此”的生活场景。这时候，即使有人提出修筑长城，大家也会感到莫名其妙，觉得“俺们都是唐王朝的子民，修长城，你皇帝是想防备谁呢？”

二

如果不是在宋朝建国之初，燕云十六州被沙陀人石敬瑭送给辽国，考虑到宋朝具有非常内向的性格，不用想也知道，它一定会毫不吝啬地拿出大把银子，跑到北部边疆，把长城修个结结实实。很可惜，它没这个机会。

不过宋朝也曾拿出大把银子修了“长城”，但它所修的“长城”并不是在绵长的山脉上依山势而建，也不是由砖石构成的，而是在今天的河北省中北部的平原地带建成的。所谓的“长城”其实就是国家有目的、有计划地大面积种植的树林和挖掘的河汉沟壑以及地下通道。这些地下通道过了一千多年，遗留下来的一部分用于对付日本侵略者，看过电影《地道战》的人想必对其功效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很显然，树林、河汉以及地下通道对防御步兵用处是很有限的，但对抵御北部草原来的骑兵，效果却很明显。据说草原骑兵为此吃了不少苦头。这种把绿化地球的事业和以杀人为目的的战争结合起来，也算是相当不错的创举。

后来，金国被蒙古人从草原驱赶出来，却不像宋朝那样，做好北部的国防工程，而是躲在长城以南，靠着已经残破的长城抵御彪

悍的蒙古兵。可是，实际效果却惨不忍睹。蒙古人不但不费什么大力气就杀了过来，而且还一路追杀到河南，和南宋联手，最后，金朝因为平时不练武功也没太注意和邻居宋朝处理好关系，被南北两个邻居灭在一个不算大的城池——蔡州城里。与其他中原王朝相比，金朝的灭亡显得非常狼狈，等于是被两个强人从上至下、从下至上压扁后，才被从地球上硬生生地抹去。

虽然宋朝没条件在北部崇山峻岭中修砖石结构的长城，但在和西夏作战时，倒是修了大量的军事要塞和城堡。从功效上看，这些要塞和城堡与长城是一样的，都是用来防守的，只是比长城的防守更厉害。

北宋，城堡修在各个关键地段，而且互为犄角。如果西夏兵拍马来，各个城堡和山寨之间则可以实施很有效的动态支援，与在长城上相对被动的防守相比，这种静态加动态的防守效果自然强得多了。即使这些要塞和堡垒经常会被西夏军攻下后强拆，但西夏人的攻城器械也并不富余，更不先进。在攻城拔寨上不占任何优势，经常为了攻下一个规模并不大的堡垒要塞，付出尸山血海的代价。里外一算，西夏人吃了相当大的亏。

范仲淹从镇守西北边陲开始，就打定主意修这种到处漏风但效率极高的“长城”。他希望通过不断把城堡向西夏腹地推进，最终把西夏人压扁，活活地把它困死。为此，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如果这一策略坚持下去，西夏国大概是人类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被敌国玩弄且折磨而死的国家。这种死法难看不说，更谈不上尊严。

纵观中原王朝实施的长城战略，应该说宋朝这次做得还是不错的，在西北为西夏国量身打造的长城，既有在“一条线”的横向防御，又有纵深上的分层次防御，更有“面”上的整体防御。保守中更显进攻，守雌中更见凶狠，以柔克刚，以雌克雄。在战场上拼国力、拼技术，而西夏的国力、科技和宋朝没法比，自然是陷入极度被动而无力的惨境。

要是说宋军总是这么有耐心地和西夏国周旋，也是不对的，有时候宋军也会雄起一把，杀出营寨城堡，主动出击。比如说，宋神宗曾主持“熙河之役”，从战役开始，宋朝就拉出灭人国祚的架势。既然是准备在短时期内不让西夏再活下去，宋军当然要主动离开城池和堡垒，到西夏国的地面上搞大规模的破坏。从战役之初的情形看，这次规模浩大的主动出击，效果还是相当令人振奋的，连续进攻得手，西夏军则手忙脚乱，惊慌失措。如果不出意外，西夏或许会被连根拔起。可是，最终的结果却让人非常失望，以至于令人痛心疾首。因为宋军各路人马配合不到位，将官之间不默契，还争风吃醋，明里暗里互相拆台，见死不救，关键时刻给战友使倒劲儿，一场轰轰烈烈的灭国战役打得丢人现眼、大败亏输，白白搭进去八方精锐和数千万的军饷。

宋朝之所以敢于打这场战役，一方面是王安石变法后，朝廷腰包确实鼓起来了，手上掌握的财政资源能够支撑这场大战役。另一方面，也是宋朝长期执行长城战略，导致西夏国力和民力大不如前。如果宋神宗能够有点耐心，在有生之年，还是有些希望能看到西夏国正式向宋朝认输的。即便熙河之役失败，只要痛定思痛，重新回

到原来的长城战略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西夏被打残了，短期内也不敢、更没能力向宋朝做大规模的反攻倒算。可是，这一毁国于无形的战略被宋神宗亲手破坏后，宋朝却逐渐陷入了乱哄哄的党派之争。在朝堂之上，再也没有实权派人物认真关心西北战略了。西夏借助上帝之手，躲过了亡国灭种的浩劫。

三

如果仅仅算算经济账，猛一看，靠修长城来防御北部草原民族的侵袭，对资源丰富和科技发达的中原王朝而言，是比较合算的。

明朝成化年间，蒙古鞑靼部经常寇边犯境，为此，明朝的大臣们不得不聚到一起，讨论如何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这就要把账算清楚，看哪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投入相对小而效果却最好。等所有的账目算完后，大家一致认为，还是修长城合算。

从大家算出的账来看，对当时准备修的那部分长城，如果征用5万劳工加以修缮，用时也就是2个月左右，花费不过100万两银子。可是，如果征调8万远征军去跑到那里驻防，一年则要耗资千万两银子。一对比，当然是修长城比不修强多了。更何况，有长城在那里摆着，派过去驻防的军队可以少很多。即使对这么少的军队也不愿意拨付粮饷的话，朝廷也可以命令他们在长城边上屯田。这些驻屯军平时可以做到自产自食，国家除了先期一次性投入100万两银子外，其他的花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相反，如果派过去8万人的军队，一旦不能一战而定乾坤，也

需要考虑在边疆屯田，但为8万人找可耕种的土地，也不是件易事。即使找到了，长城边上的土地品质和肥力能否供养8万人的吃喝也是一个问题。即使能够勉强供养，安置如此众多且来自全国各地的军人，让他们除了打仗还兼职当农民，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大的麻烦，以至于让人不愿意仔细思量。8万人在边疆扎下根，一旦在经济上独立，后果是相当可怕的。有经济基础的武装队伍，而且还处于专制王朝控制的边缘地带，却和觊觎中原财富的草原部落近在咫尺，双方长期对峙、相处，控制不好的话，时间长了很容易出现安禄山之类的人物。有野心的军阀形成割据势力，对皇权造成的戕害想必大家都是清楚的。

一帮精明且善于为皇帝解忧的大臣们算完账后，朝野内外对修长城一事自然都很兴奋，深感太祖和成祖把蒙古人赶过了长城，真是英明千载啊！如果还让蒙古人占据燕云十六州，明朝再变成第二个宋朝，哪还会有躲在长城后面，不费事地抵御草原兵团这么合算的好事呢？

可是，纵观明朝，国家修长城虽不能说没效果，可总是在最关键时刻，没有让长城发挥出什么太大的实际效用。相反，还总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让皇帝和忠臣们相当纠结。这种情况屡次发生后，只能说明长城本质上不过是个华丽而高级的摆设而已。

公元1449年，明英宗在土木堡被瓦剌人活捉了，人家瓦剌人一鼓作气越过长城，直接杀到北京城下。嘉靖皇帝在位时，土默特部的俺答汗也曾越过长城杀到北京郊区，大肆劫掠了一番，腰包鼓到一定程度后，心满意足地回去了。而到了崇祯年间，皇太

极的部队虽然从山海关打不进来了，但他们从古北口等地照样突破了长城防线，以至于在河北大平原上走哪儿抢哪儿，最南端甚至跑到了山东。

这么看，如果算成本收益，讨论修不修长城的问题时，除了算清楚投入产出外，还需要看如果想实现预期的产出，需要什么样的配套条件。如果没有真正强悍的部队在长城上，长城即使修得再扎实，也没有实际用处。比如，戚继光在慕田峪附近修过长城，北部草原的骄兵悍将几乎很少和戚家军打照面。倒不是怕这里的长城坚固打起来吃亏，关键是怕这里驻扎着训练有素的戚家军。这样看，如果长城沿线到处都有像戚家军这样的部队驻防，修长城自然很合算。相反，让一帮只善于、也只喜欢种田经商的军队守长城，对长城投入再多也是白搭。

四

说到底，长城是中原农耕民族解决与草原游牧民族利益冲突的工具之一。不能说这个工具完全是摆设，但绝不能高估这个工具的价值，更不能抱有任何幻想，觉得依靠长城就能过上安稳而踏实的日子。鉴于此，要很好地解决游牧民族和中原王朝的利益冲突，还要想些其他高明而有效的招数。

汉朝时候，深受儒家理论熏陶的大臣刘敬，给皇帝出主意，通过匈奴单于与皇室女联姻，在汉匈高层之间建立亲戚关系，从此一劳永逸地解决汉匈冲突。按照儒学的观点，这个想法是很在理的。